

寻求理性的理解

——读钱林森先生《中法文化对话集》

袁筱一

翻译做久了，有时的确会忘记自己的存在，只能感受到无限接近他人的愿望和过程。那是一种微观的，深入具体的文本里与之耳鬓厮磨的过程，固然有十二万分的真诚、勇气与努力，但其中翻腾出的种种冲突与讨论，总脱不了私人情绪的嫌疑，更像是自怨自艾的呓语。

是在这个基础上对钱林森先生的这部对话集生出了很多感喟：感喟他在一如既往地沉浸于法国文化、文学的同时却能够有足够的冷静确立、捕捉自身的存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充分理解他“捕捉‘他者’跃动、鲜活的文化精魂来丰富自我”的努力，充分理解他构筑对话平台的努力。如果说作为一个译者，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将一手创建的“他者”直接推到读者的视线中，自己玩着所谓的“不在场游戏”，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的学者却永远无法推卸铸就平等对话环境的理想。

这在今天不是那么容易。比较学科有过令我们欢欣鼓舞的时刻，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西方的后殖民学者们就已经过于清醒地意识到“差异”——不仅是平面的差异，而且是纵向的权力差异——为比较学科带来的阻碍。这二十年里我们不是一直在忧虑比较学科的未来吗，后现代的学者们忧心忡忡地说，必须建立在“差异”之上的比较文学有走向末路的征兆。在这样的形势中，我们有可能问的一个问题是：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在哪里？

然而钱先生似乎没有时间过多地耽搁在理论的陷阱里，他有的只是坚持。也许，如果说平等对话是有可能的，或许读完这部对话录，第一个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平等对话的可能性从来不曾自生自灭地“在”那里，它取决于我们的创造。于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钱先生陆陆续续实现了二十九次对话，二十九次人为的“碰撞”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统一的主题、统一的方法和丰富的内容构成整体。这在而今充满了怀疑、彷徨的比较学界里简直是一座小小的，耀眼

的乌托邦。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个华裔院士程抱一，汉学家程艾兰、谢和耐、于连、戴鹤白、马悦然、郁白，翻译家李治华、雷维安、杜特莱，华裔艺术家或作家朱德群、赵无极、熊秉明、山飒……这些不仅仅是在比较文学学界中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个地走进钱先生精心搭建的对话平台中，他们谈论自己，也谈论自己所处的世界——因为他们而多了一点色彩和一点理解的可能性的世界；他们对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有所思考，他们也在钱先生的敦促下，试图勾勒未来理解和交流的框架。尽管对话者站在不同的立场，谈论的是不同的东西，他们却都相信一点：那就是程抱一先生告诉我们的，“文化与文化之间可以相互连接，可以相互渗透”。

事实上，倘若我们是有心人，我们很快就能够发现钱先生的眼光和选择，他已经巧妙地避开了平等对话的可能性问题。先生选择对话对象的标准很简单。我们看到，这些对话者，无论他们是怎样的身份、地位与职业，他们本身都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即便是表面上和中国关系不是那么大的托多罗夫和克里斯特娃之所以进入钱先生的对话视野，应该也是凭借他们跨语言、跨文化的身份。后现代学者们的贡献不容否认：差异的确是比较的基础。因为差异是出发点，是世界的文化版图，而求同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理想，哪怕历经嘲笑，哪怕永远无法达到“同”的彼岸。正是在这些对话个体的身上，我们得到了完美的证明，越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文化差异、冲突和碰撞的人，他们的眼光越是世界性和普人类的。

因而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这部对话辑录。这里的对话是双重性质的，一重是普通意义上的，钱先生与这些有着相同梦想的同行们的对话；一重则是灵魂内部的对话，是退一步以后，与“在世”的另一个自己的对话。和我们想象中的有所不同，钱先生在对话中扮演的角色不完全是对话的一方——也就是说，在对话录中，他并不代表“中”去和“西”碰撞。他更像是一个导演，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所有对话者灵魂中原本存在的两个世界碰撞了，生产出令我们动容和迷醉的话语瞬间。因为时间的流逝，他们有可能已经忘记最初的碰撞，又或许他们还没有想过要描绘这种碰撞，但是钱先生的几句话就挑起了记忆，挑起了他们理性地理解自己内心这一文化事件的愿望，挑起了他们退后一步看待自己、看待自己跨文化的境遇的愿望。如同德吉在谈到诗歌翻译时所说的那样，这里的对

话同样“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流，也是一种跨历史的交流”，它同样呈现“纵向的意义”。而与此同时，钱先生也记录下了一个个原本有可能和话语失之交臂的瞬间。对话的“横向意义”当然更不必说，横向的意义，是身处不同文化领域的大师们以最自然的方式带入对话的：我们听翻译家谈翻译，听小说家谈他们创造的想象域里的中国，听汉学家谈他们理解中的中国哲学、文学、文化，听画家谈融和的意境之美……

是的，话语。我们不会怀疑，这样的对话是思考最自然、最纯真的状态，还未受到意义过剩的概念和词语的污染。因而这些大师级的人物面对着钱先生，几乎都把他们最坦诚、最自由的一面拿了出来。没有理论框架的约束，我们看到的都是最为质朴的理解的欲望。理解另一种文化，同时也理解自己。与我们平常人等不同的只是，这是一种寻求理性的理解——如果我们用对话录中托多罗夫的语汇——的愿望。是落进了话语，落进了语言里的理解。

然而这不就是存在本质吗？就好像和比较文学不无关系的翻译理论研究。法国的翻译理论家安托尼·贝尔曼（Antoine Berman）曾经建议用“思考”（réflexion）与“经验”（expérience）来替代“理论”与“实践”。因为假如我们不坚持把“学科”的意义看得如此重要，思考是很能够说明比较文学或翻译研究的本质的。思考从来都是我们经历理性的理解的一种方式，它直接接触及存在的灵魂，它是我们超越界线之外的唯一方式。

因此，作为读者，我们的欲望也被挑起来了。阅读这部对话辑录应该也是我们寻求理性的理解的过程，理解自己，在以诚挚、开放和平等的心态向“他者”走去的过程中。在今天的世界，交流也变成了一种产业，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快捷，甚至越来越多样，然而理解却事与愿违，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不回到钱林森先生为我们营造的单纯而美好的气氛里，忘记那些艰涩的概念与理论秩序，和这些平常看起来不那么容易亲近的大师们聊聊天呢？没有什么功利目的的阅读过程中，我们仿佛也拨开词语的迷雾，找回了灵魂最轻松、却最真实的状态。阅读可以随时开始、随时停下，我们可以随时沉溺于一句话为我们带来的喜悦与震撼中。一句话，有可能是郁白所说的“尽量亲近文本的阅读是对遗忘的抵抗”有可能是出现在熊秉明话语中的那句鲁迅先生的（而这话原本出自裴多菲之口，这是多么好的，对话创造新的灵魂的例证）“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也有可能是程艾兰简单却有力的质疑，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学者会“对自己的传统不感兴趣，反而对西方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方法论入了迷。他们满口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

而在这部对话辑录中，我很喜欢托多罗夫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他说知识分子把“价值变成他思考的对象本身”，知识分子“把我们经历的具体性和普遍性对比，创造一个我们可以讨论价值合法性的空间。他拒绝把真理沦为科学家所倚仗的与事实的单纯吻合，也拒绝像战士一样把真理变成启示的真理。他更希望一种揭露的协调的真理，人们在接受自省和对话中向着这个真理前进”。这应该是对包括钱先生在内的所有对话者的定义，也是我们在阅读这部对话集之前所需要做的唯一准备。“创造一个我们可以讨论价值合法性的空间”，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许不再需要追问，构筑平等对话平台的理想究竟价值何在。不平等是事实，所有的对话者几乎都没有否定和回避这一点，从与程抱一先生的开篇对谈开始，到罗多弼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总是倾向于“把‘他者’的文化传统看得很狭窄“（的确，权力差异也决不仅仅是社会政治范畴内的），在钱先生的追问下，对话者都显示出了直面和自省的勇气。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吧。而坚持平等对话的理想，努力构筑平等对话——这份平等，应该也是跨文化、跨语言的人在面对自身时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的语境，更是这部对话辑录的始作俑者对自己的规定。

自然，但凡与外国文学有些瓜葛的人大约都不会觉得钱先生是陌生人。从将近二十年前的《中国文学在法国》开始，到他最近主持翻译的《法国文化史》，不知道让多少我这样的忠实读者受益解惑。这部对话辑录是另一种形式，在钱先生一贯擅长的资料之外，更有对话过程中因为彼此交融而产生的思想的深入，有为了接近对话者，为了让对话集的读者能够接近他们、平等对话的精心准备。能够以成长的二十年见证先生的坚持，虽然并不在比较文学的门内，却是由衷的感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我自己觉得没有资格为这部对话集写序，却还是惶惶地领受了先生的任务。能够一起寻求理性的理解，能够加入钱先生所营造的对话，能够在“自省和对话中“向着真理前进，那是怎样的幸运呢？